

“後歸僑”寫作： 冷戰年代的離散、創傷與認同

張松建^{*}

摘要 冷戰年代（1946–1991）的歸國華僑（簡稱“歸僑”）數量眾多，其中有極少數作家。歸僑作家的文學創作已經引起學界注意，但仍有少數另類作家尚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這些歸僑後來離開中國內地，移民境外或海外，最終回到原來的出生地，筆者稱之為“後歸僑”。後歸僑之“後”有兩層涵義：一是時間的終結，即歸僑在中國內地的居留生活的完結；二是性質上的改變，即從擁抱“民族主義”到走向“世界主義”，從追逐“左翼理想”到轉向“自由主義”，從“回歸原鄉”到“認同南洋”，從世俗道路上奔波的“無神論者”到過上了屬靈生活的“基督徒”。本文以三位來自新加坡、又回到新加坡的“後歸僑”作家——忠揚、原甸、駱賓路——為個案，研討他們在新加坡、中國內地、香港的跨國生涯和寫作歷程，聚焦於四個關鍵詞：“冷戰”、“離散”、“創傷”與“認同”，使用理論化和脈絡化的方法閱讀文學文本，分析他們從“海外華人”到“歸國華僑”再到“後歸僑”的身份轉變及其原因與後果，為理解冷戰年代的歷史與文學提供一個獨特的批評視野。

關鍵詞 冷戰 歸僑 離散 創傷 認同 後歸僑

^{*} 張松建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導論：冷戰與歸僑，創傷與文學

“冷戰”（The Cold War）是全球範圍內的一場曠日持久的地緣政治衝突與意識形態對抗，大體上從 1946 年 3 月開始，在 1991 年 12 月落幕。“歸僑”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現象，已得到國際歷史學者的關注。那麼，如何從文化、政治上理解冷戰年代的歸僑現象？詹明信 (Frederic Jameson) 說過：“歷史除非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們，換言之，我們只有通過預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歷史。”¹ 本文試圖通過對文學文本的批評分析，研討冷戰背景下另類“歸僑”的精神結構和文化政治。

海外華人、華僑和僑眷從出生地或居住地移入中國，是為“歸國華僑”，簡稱“歸僑”。歸僑也是移民社會學、歷史學、離散研究、國際關係學的研究對象。² 歸僑屬於現代中國史上的常有現象，華僑歸國的主要原因有抗戰救亡、升學就業、家庭團聚、職業發展等。從 1949 年到 1970 年代，東南亞出現過三波大規模的華僑華人歸國潮，他們主要來自新加坡、馬來亞、印尼、越南，³ 歸僑中有極少數人是文藝工作者。大部分歸僑作家的歸宿是葉落歸根，一勞永逸，終老於中國內地。少數人在歸國若干年後、甚至十多年後，又離開內地，移民境外，這些另類歸僑作家例如忠揚（1938–2022）、原甸（1940–）、駱賓路（1935–），因為各種原因未能進入研究視野。王德威教授曾發明“後遺民”（Post-loyalist）的概念，研討當代華語文壇的一個重要現象，⁴ 本文受其啟發，提出“後歸僑”（Post-returnee）的說法，指代那些後來擺脫了“歸僑”身份、思想認識發生了重大變化的人。主流歸僑文學在主題與寫作風格上歌頌文化民族主義，皈依血緣神話，追逐原鄉故土，讚揚新政權的政治合法性。

1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 (Frederic Jameson, 1934–2024) 著，王逢振、陳永國譯：《政治無意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年），頁 72。

2 關於國際學界的歸僑研究，參看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 年）；孫愛玲：《論歸僑作家小說》（新加坡：雲南園雅舍，1996 年）；黃小堅：《歸國華僑的歷史與現狀》（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奈倉京子 (Kyoko Nagura)：《“故鄉”與“他鄉”：廣東歸僑的多元社區、文化適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 年）；牛軍凱、袁丁編：《歸國與再造僑鄉——越南歸難僑訪問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 年）；Glen Peterson,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Ong Soon Keong, *Coming Home to a Foreign Country: Xiamen and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1843–193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張松建：《亞洲冷戰與文學想象》（台北：秀威資訊出版社，2024 年）。

3 原不二夫 (Fujio Hara) 著，劉曉民譯：《馬來亞華僑與中國》（曼谷：大通出版社，2006 年），頁 317。

4 關於“後遺民”的定義，王德威指出：“所謂的‘後’，不僅可暗示一個世代的完了，也可暗示一個世代的完而不了。而‘遺’是遺‘失’——失去或棄絕；遺也是‘殘’遺——缺憾和匱乏；遺同時又是遺‘傳’——傳衍留駐。後遺民寫作的‘後’，原有自遺民論述的窠臼解放之義。但事實不然。如果遺民意識總已暗示時空的消逝錯置，正統的替換遞嬗，後遺民則變本加厲，寧願更錯置那已錯置的時空，更追思那從來未必端正的正統。”參看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 年），頁 6。

本文所討論的“後歸僑”作家則不然。他們早年與主流歸僑作家並無二致，然而到了後來，因為遭受政治暴力，留下創傷心理，產生懊悔和幻滅之意，於是離開中國，移居海外，在文學世界中痛陳不義，見證不公，與往昔持守的意識形態分道揚鑣，是為“後歸僑”。回到本文研討的三個作家。從 1957 年到 1964 年，忠揚、原甸、駱賓路以青壯之年告別南洋，來到中國內地，成為“歸僑”。然而，他們很快就捲入了政治運動中，身心受創，苦大仇深。後來，他們痛定思痛，離開內地，流亡香港，是為“再離散”和“再移民”。流寓香港一、二十年後，他們先後重返新加坡，恢復公民身份，人生與事業掀開了新篇章。這三位作家有類似的人生歷程、集體記憶和情感結構。準此，從“歸僑”到“後歸僑”是一個時空流動、身心重整和國族認同轉變的過程。

本文嘗試提出下列問題意識：這三個“後歸僑”作家的回歸、告別、再離散、重返的跨國流動，與 1950 年代到 1990 年代的冷戰語境存在什麼關係？如何理解這些作家從“歸僑”到“後歸僑”的身份轉換和思想變化？這類特殊移民是否挑戰了民族主義的歸僑敘事？與 1980 年代湧現的主流歸僑文學相比，這些所謂的“後歸僑”寫作是否提供了新的批評思考，其洞見和盲點是什麼？這些作家的創傷敘事為我們理解中國歷史和香港社會是否貢獻了創造性想象？鑒於歸僑文學涉及南洋華人、中國現代歷史文化、當代中國文學等層次，蘊含豐富，意義重大，因此，本文研討忠揚、原甸和駱賓路的跨國流動與文學生涯，期望帶動學術界對南洋文學、中國當代文學、香港文學的再發現與再認識。需要說明一點，本文啟用的“後歸僑”標籤特指那些起初回歸中國，後來移出中國、遷徙海外的華人，並不涵蓋以下兩類群體：其一，留居中國內地後對回歸和移居感到幻滅的作家；其二，未赴中國大陸卻持續批判“歸僑”身份政治的群體。

一、歸僑前傳：冷戰年代的南洋左翼作家

1946 年 3 月，冷戰拉開了序幕，很快波及到亞洲。1948 年 6 月 20 日，英屬馬來亞政府頒布“緊急法令”（Malayan Emergency），隨後實施“新村運動”（New Village Movement）計劃、針對馬共的軍事圍剿、以及其他戒嚴措施。⁵ 在漫長的冷戰

5 關於“馬來亞緊急法令”的最新研究，參看 Kate Imy, *Losing Hearts and Minds: Race, War, and Empi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915–196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173–243. 本書關注士兵與平民的戰爭經驗，聚焦在種族與性別的向度，提出了許多頗有人文關懷的批判思考。

年代裏，東南亞國家出現過反共民族主義的潮流，排華運動盛極一時，⁶ 數萬左翼人士被驅逐出境，大量華僑從南洋回國，包括胡愈之、巴人、馬寧、洪絲絲、黑嬰、韓萌、蕭村、丘士珍等左翼作家。

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期，南洋文學出現繁盛局面。蘇俄和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理論流傳到南洋，中國左翼作家南下，當地左翼思潮蓬勃，例如，1947至1948年的“僑民文藝”和“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論爭，1955年的“愛國主義大眾文學”的倡議，1953年“反黃運動”的興起，都是顯著的例證。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革命文學和俄蘇文藝理論對新馬華人作家提供了思想資源，忠揚、原甸、駱賓路生逢其時，吸收借鑒，迅速成長為作家。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忠揚、原甸、駱賓路走上南洋文壇。這三位左翼青年熱愛俄蘇文學和中國“五四”新文學，傾心寫實主義，嚮往“新中國”。駱賓路早期的作品數量不多，目前很難尋獲，他早在1957年6月就離家北上。⁷ 所以，本節重點分析忠揚的文學評論和原甸的新詩寫作，時間在他們北上之前，地點在新加坡。

忠揚發跡於五十年代末的星馬文壇，馳名於六十年代初，擅長文藝評論，堅持“現實主義”理論。⁸ 其文章的特點是：熱愛理論思辨和宏大敘事，提倡“文藝大眾化”，左翼立場鮮明。忠揚對世界文學史進行簡化的、粗糙的描述，認為從古到今存在着“為人民與反人民的對立，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的抗爭。”⁹ 其實，關於現實主義文學，國際學術界早有豐富的論述，“歐美”和“俄蘇”是兩個不同的系統。不同於歐美系統的現實主義文論，忠揚選擇的是“俄蘇”版本，他強調階級鬥爭和人民史觀，引用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高爾基、法捷列夫的看法，突顯現實主義的人民性、民主性和真實性——

歷來現實主義在創作方法上的共同特點，還是通過形象化的藝術概括，忠實地描繪了人民對於自然的鬥爭與社會的鬥爭，創製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以

6 詳細分析參看Wen-Qing Ngoei, *Arc of Containmen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ticommunism in Southeast Asi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7 駱賓路，原名楊書楚，中正中學畢業，當過記者，辦過雜誌，在1950年代初署名“木易”，開始在報章發表作品。

8 忠揚，原名陳鴻舉，筆名有呂珊、陳熙等，1938年生於新加坡。中正中學畢業後，由於家道中落，無法升學，偶然看報，觸發文學創作的興趣。忠揚曾經主持新加坡《星島報》的編務，主編“草原文化社”、“長空出版社”和“愛國出版社”的文藝叢書，擔任文學講習班講師和電台編劇，1959年出版合著文集《文化問題及其他》，1962年出版《文學與人民》，在當地文化界備受注目。參看忠揚：〈《點染書情》代自序——我是怎樣走上文學寫作的道路〉，見氏著：《忠揚文學雜論集》（新加坡：斯雅舍，2010年），頁104-05。

9 忠揚：〈論文藝大眾化〉，載氏著：《文學與人民》（新加坡：草原文化社，1962年），頁2。

及由此而表現他們改革現狀，嚮往美好生活的要求與願望。現實主義的這種特點就是鮮明地劃分了它與反現實主義之間的界線。¹⁰

強調世界觀和創作方法的對應關係，突出作家的道德責任感和政治能動性，相信文藝作品有改變世界的潛力，這些看法顯示忠揚準確把握到“革命現實主義”的核心。經過忠揚的反覆闡述，“革命現實主義”的目標得到了清楚展現：關懷人的內在價值、尊嚴和平等，拒絕把文學視為智識的遊戲、形式主義的審美造物 and 純粹的語言構造，批判權力結構，喚起個人主體的覺醒，獲取集體身份和政治意識，承諾社會變革。

忠揚的文學批評關注馬來亞社會現實，他不但是“革命現實主義”而且是“本土現實主義”——在這一點上，他和南來左翼作家胡愈之（1896-1986）、李玄（楊嘉，1917-1995）、洪絲絲（1907-1989）等拉開了距離。從1947年1月到1948年3、4月，馬華文壇出現過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與“僑民文藝”的大規模論爭，富有成效地促進了馬華文學的“本土化”進程。¹¹ 忠揚受到這股思潮的影響，他指出，馬華現實主義文藝的基本特徵是反映馬來亞社會的真實，通過對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創造，達到教育廣大人民的目的。然而忠揚失望地發現，當下馬華文學因為自身缺乏與勞動人民的緊密結合，被迅速發展的社會情勢遠遠地拋在後頭了。¹² 忠揚認為，馬來亞社會的殖民地性質是導致馬華文藝不能興盛的根本原因，人民對馬華文藝有強烈要求，而當前大部分作品卻沒有反映人民的意志和願望。¹³ 在忠揚這裏，泛道德化的“人民”被確定為文藝批評的至高標準，而實際上，人民不是鐵板一塊的堅實存在，而是一個鬆散、籠統、抽象的概念，包含五花八門的階層、身份、思想觀念和利益訴求。忠揚還說，一些馬華文學作品推崇個人主義，流露悲觀厭世情緒，思想貧弱頹喪，不可救藥地走向形式主義與自然主義，¹⁴ 他毫不客氣地羅列一大堆馬華作家，例如李星可（1913-1996）、葉苔痕（1905-1982）、周槃（1934-）、憂草（1940-2011）、黃槐（姚紫，1920-1982）、宋雅（1939-2024）。作為補救措施，忠揚鼓勵馬華文藝發揚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傳播雄渾明朗的樂觀主義信念。¹⁵ 這種對集體認同和崇高美學的迷戀是左翼文學的主要特徵，目的是創造新人、

10 忠揚：〈論文藝大眾化〉，頁2。

11 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與“僑民文藝”的論爭，參看方修：《戰後馬華文學史初稿》（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會聯合會總會，1987年），頁29-80。

12 忠揚：〈關於馬華文藝的思想性〉，載氏著：《文學與人民》，頁22。

13 忠揚：〈關於馬華文藝的思想性〉，頁23。

14 忠揚：〈關於馬華文藝的思想性〉，頁23-24。

15 忠揚：〈關於馬華文藝的思想性〉，頁29-30。

新文化和新政治。

忠揚一生信服現實主義文藝理論，晚年依然如此。¹⁶不過，現實主義文藝作品有不同的檔次，上焉者達到了盧卡契（György Lukács, 1885–1971）所說的“真正的、偉大的現實主義”的境界，¹⁷末流則淪為韋勒克（René Wellek, 1903–1995）所嚴厲批評的那樣：“總是蛻化為新聞報道、論文寫作、科學描述，一句話，就是蛻化為非藝術。”¹⁸從以上分析可以發現，忠揚念念不忘的現實主義文論的缺點明顯：窄化和限制文學工作者的想象力，太過強調作家的身份政治，誇大文藝的社會功能，對主題和題材的重視超過了對審美問題的思考。

與現實主義密切相連的是“文藝大眾化”。對此，忠揚指出，“大眾化”的作品不可誤解為單純的形式通俗化，“大眾化”不能簡單等同於民間文藝形式的運用或在作品中穿插大眾日常口語，不能把語言、結構和技術代替思想內容，應該避免變成反現實主義者和形式主義者。思想認識與表現手法相統一，內容的人民性和形式的群眾性，在作品中取得結合，這才是“大眾化”的創作。¹⁹在二十多年後出版的《新馬文學論評》當中，忠揚的〈論文藝大眾化〉這篇理論文章卻沒有收錄其中，這似乎說明由於忠揚在“文革”中領教過“群眾”的愚昧和暴行，他的左翼理想幻滅了，對文藝“大眾化”已不抱信心，他對現實主義文論依然重視，但不再看重階級鬥爭、革命政治。

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原甸是一名活躍的青年作家，他狂熱地閱讀文學作品：“艾青、郭沫若、聞一多等名家的詩集成為他們手中的至寶，他們常常挑燈夜戰，把整本整本詩集抄錄下來。”²⁰在青年書局的資助下，原甸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青

16 忠揚在1989年接受新加坡《新明日報》訪談時指出，現實主義不是僵化偏執的教條，而是具有開放性和變化性的活力。參看陳愛玲：〈去國26年不忘故鄉情〉，載《忠揚文學雜論集》（新加坡：斯雅舍，2010年），頁173。

17 盧卡契（György Lukács, 1885–1971）的原話如下：“真正的、偉大的現實主義就是這樣把人和社會當作偉大的實體來加以描寫，而不僅僅表現他們的某一個面向。用這個標準來衡量，無論是由單純的內省或由單純的外傾來決定的藝術流派，同樣都會使現實趨於貧乏並且將它加以歪曲。因此，現實主義的意義就是給予人物和人的關係以獨立生命的立體性、全面性。”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外國文學研究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編：《盧卡契文學論文集（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48。

18 雷內·韋勒克（René Wellek, 1903–1995）著，張金言譯：《批評的概念》（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9年），頁244。

19 忠揚：〈論文藝大眾化〉，頁19。

20 原甸原名林佑璋，1940年出生在上海，1946年隨家人移居新加坡。他的中小學時適逢冷戰年代，見證英國殖民政府制造的白色恐怖，愛國群眾參加的反帝反殖運動、華校師生和作家組織的文藝運動，例如“五一三事件”和“反黃運動”，他參加過一些學潮、抗議和罷課。就讀華僑中學和中正中學期間，他積極參加文學社團活動，在新馬報章發表文學作品。因為仰慕“七月派”詩人綠原和蘆甸，他自取筆名“原甸”。

春的哭泣》。²¹隨着馬來亞獨立和新加坡自治，愛國主義風行一時。原甸生逢其時，他走向國族，擁抱大眾，揮灑愛國熱情。這本詩集收錄二十四首詩，有鮮明的時代感和南洋色彩，意象宏大，情感濃烈，語言樸素明快，字裏行間植入歷史記憶和社會批判，洋溢着粗獷有力的現實主義風格，獲得忠揚的高度評價，²²也不難發現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 1799–1837）、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 1893–1930）、田間（1916–1985）、臧克家（1905–2004）對他的影響。據說詩集銷路很好，讀書界有積極反響。四十年後，原甸回憶這件事，依然非常興奮。²³

詩集《青春的哭泣》描繪印族修路工、嗩吶手、扒手、鋌而走險的男子、苦於旱災的百姓，原甸對他們表示發自內心的同情。〈手的詛咒〉有民粹主義、反智主義和身份政治的意涵，雖然古代中國和民間諺語也有類似的說法，不過左翼文學的民粹和反智主要起源於馬列主義和俄國民意黨人。這首詩的結尾寫道：

我要把一千回的詛咒／投給我們的這雙無用的手／我們的這雙白而嫩的／—知識分子的手！²⁴

這句話在詩中重複了三次，如當頭棒喝，擲地有聲。這種自我厭棄和自我詛咒帶有追求道德淨化的真誠動機，然而，對階級平等和人類正義的急切嚮往，也讓詩人無視社會分工的必要性。原甸給出的理由很簡單：知識分子不從事體力勞動，沒有保家衛國的本領，當災難臨近時，只會用雙手抱頭和擦淚，只會在革命隊伍中撫摸自己的小小傷口，只會在工作時長吁短嘆、捏緊眉頭。顯而易見，詩人藉助於嚴厲的靈魂拷問傳達出集體主義和左翼政見。

《青春的哭泣》給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表達愛國主義的作品。當然，知名度最高的當推〈我們的家鄉是座萬寶山〉。本詩有六十八行，四行一節，一共分為十七節，語言生動活潑，韻律鏗鏘有力，讀來朗朗上口，家國情懷呼之欲出：

在終年炎熱的赤道上／有一顆光輝燦爛的寶石／它曾經埋在荒草中一個世紀／如今在風雨中閃耀着迷人的光芒／／她曾經是豬仔們夢裡的天堂／也是我們祖

21 參看原甸：《馬睏人未倦——我的半生拼圖》（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年），頁1–79；原甸：《我的文學不歸路》（新山：陶德書香樓，2003年），頁2–10。

22 忠揚：〈談原甸的處女詩集——《青春的哭泣》〉，載氏著：《新馬文學論評》，頁54–55。

23 原甸：《馬睏人未倦——我的半生拼圖》，頁74–75；原甸：《我的文學不歸路》，頁10。

24 原甸：〈手的詛咒〉，載氏著：《青春的哭泣》，頁24。

先含恨躺下的墳場 / 它曾經是侵略者們垂涎的地方 / 但馬六甲海峽卻有驚天的波浪 / / 你稱呼它“世界的膠園” / 你稱呼它“世界的錫倉” / 椰風飄過榴蓮的芬芳 / 我們都驕傲地稱它：“家鄉！家鄉！”

詩人把馬來亞比喻為物產豐富的萬寶山，他回顧先輩拓荒的歷史記憶，羅列一系列的地景風物，批判殖民帝國的侵略奴役，表現出強烈的戀地情結和國族認同。

最後，必須提到詩集裏的〈一封信〉，寫於1961年10月，這是作者北上中國的自我實現的預言。這首抒情小詩有二節，每節四行，一共八行，文字簡潔純粹，含有淺淡的童趣和動人的深情，近似於一首現代絕句：“遠方的朋友 / 寄來一封信 / 信封的四角 / 散着春天的氣息 // 貼着耳朵聽 / 一串朗笑的聲音 / 拆開來一看 / 一紙的歡喜”²⁵ 歸國僑生從中國寫來一封書信，身在南洋的原甸讀後激動不已，對新中國的崇敬油然而起。果然，三年後原甸就辭別家人，孤身離開南洋，懷着深沉美好的感情，奔赴社會主義新中國去了。

忠揚、原甸、駱賓路的“北上”行動由多重因素促成。第一，他們在中學畢業後，由於家境貧寒，無力升學，或高考落榜，求職無門，面臨失學和失業的雙重壓力。第二，他們是思想左傾的文藝青年，感時憂國，參加過學潮、罷課和抗議。冷戰年代的新馬社會籠罩在白色恐怖下，左翼青年焦急尋找逃出生天的機會。第三，1949年10月1日，在內戰中勝出的中共在北京建立新政權。邦國初造，震撼國際，對海外華僑華人產生了強烈吸引力。第四，傳統華人社會的血緣神話和葉落歸根的觀念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總而言之，忠揚、原甸和駱賓路這三位僑生的北上行動，起因於移民社會學所謂的“推拉作用”(Push-Pull Factors)。於是，駱賓路在1957年，忠揚在1963年，原甸在1964年，紛紛離家出走，北上遙遠陌生的“祖國”。

二、北上中國以後：歸國華僑的創傷記憶

說到這三人的中國經驗，時間長度不同，受創程度不一。當輪船抵達廣州黃埔港，火焰般的五星紅旗迎風招展，原甸異常興奮。他後來的回憶錄這樣描述道：

我年輕的心激情翻滾，我知道，我已經抵達了一個奇異的國度，它的制度是社會主義，據說是一個人能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國度；據說是一個可以讓人的

25 原甸：〈一封信〉，載氏著：《青春的哭泣》，頁29。

才能和智慧大大發揮的國度。啊，中國啊，我來了……²⁶

原甸在中國大陸居留一年零十個月，只能算是一個“匆匆過客”。但公正地說，原甸在中國，雖然理想受挫、產生了失落感，但稱不上遭受了磨難。證據如下。十多年後，他在香港出版詩集《寫在中國的詩》，其中有四首新詩在北京創作，時間從1964年8月到1965年10月，內容是歌詠香山紅葉、中秋泛舟北海、結伴攀登香山、參加國慶節舞會。這些詩有民歌的趣味，輕鬆活潑，透露出原甸在當時的愉快心情，毫無創傷心理。²⁷

相對而言，駱賓路和忠揚在文革中的創傷比較嚴重，下面分別敘述和分析。

駱賓路原名楊書楚，1935年生於新加坡，曾經就讀於端蒙小學、南洋工商補習學校、中正中學分校。他熱愛文學，1950年代初署名“木易”，在《南方晚報》的《綠洲》副刊發表作品。從中學輟學後，辦過雜誌《人聞》月刊，當過《新報》外勤記者。1957年6月，駱賓路北上中國，當年7月就在北京華僑補習學校讀書。²⁸ 1958年4、5月份，他來到西雙版納的景洪農場加入支邊隊伍。1962年考入雲南大學英文系，畢業後正好趕上“文化大革命”爆發。1968年開始在滇西小鎮芒市教書。1973年8月，駱賓路以“奔喪”的理由申請出國，被批准後，他攜家離開內地，移居香港。輟筆二十五年（1957–1981）後，在1982年左右，他受到朋友駱明（原名葉昆燦，1935–2025）的鼓勵，重新開始創作。1996年，駱賓路在香港出版微型小說集《她說，藍的是天空》。

“文革”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國族創傷，也是之後的知識分子進行文化建構和符號表徵的對象。新馬歸僑遭受傷害有其特殊脈絡。東南亞是海外華人最大的集中地，人數多達兩三千萬。從辛亥革命到抗戰救亡，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東南亞華人都付出了熱情支持和巨大犧牲。歸國華僑來自東南亞的人數最多，他們在東南亞居住國擁有豐富的人際網絡和財力資源，這種特定的海外關係成為歸僑群體的原罪，使得他們在“反右運動”和“文革”中遭受了磨難和痛苦。駱賓路的微型小說集《她說，藍的是天空》中的六篇作品都有自傳性質，表現華僑歸

26 參看原甸：《馬晒人未倦——我的半生拼圖》，頁87。

27 原甸：《寫在中國的詩》（香港：新馬文化社，1976年），頁37–48。

28 駱賓路在齊亞蓉的訪談解釋了他回歸中國的原因：“工作半年之後，他的健康出現狀況，經醫治病情好轉，但工作依舊不順遂。思前慮後，他覺得回國深造不失為一條出路，於是萌生北歸念頭。”參看齊亞蓉：〈咖啡，正香濃——駱賓路專訪〉，新加坡《源》，第165期。關於《人聞月刊》的創辦和停刊經過，參看駱賓路：《看海去》（新加坡：新加坡文藝協會，2003年），頁143–47；駱賓路：《點點滴滴在心頭》（新加坡：斯雅舍，2010年），頁151–52。

國後在“文革”中遭受的政治磨難。這些作品的手法和風格不同，有的是血淚斑斑的揭露，有的是輕鬆幽默的諷刺，有的是對荒誕現象的戲仿。〈西裝恐懼症〉中描寫歸國僑生的兩件西裝在“文革”中被抄家的紅衛兵發現了，他被扣上一個罪名，做了三年八個月的苦力。後來他被放出了牛棚，兩套西裝也被改成了中山裝，可他自此患上“西裝恐懼症”，即使在香港生活多年也不敢公然穿上西裝。與昔日的造反派意外重逢後，他的恐懼症奇跡般地自愈了。²⁹〈怎可以槍斃〉的主人公是歸國華僑李孝賢，他與兒子都在“文革”當中遭到紅衛兵的誣陷，甚至連他遠在南洋的父親也成了“反動資本家”。李孝賢遭到幾個名為“向東”、“衛東”、“衛紅”、“立新”的紅衛兵的凌辱，從事強迫勞動。後來，他讀到這幾個造反派被判處死刑的法院佈告以後，失常地大笑起來。³⁰〈什麼都可以入罪〉採用荒誕派小說和黑色幽默手法再現華僑歸國後被政治暴力造成的創傷記憶。主人公是一名從海外歸來的知識分子，在中國內地待了足足十七年，在政治運動中被誣為“裏通外國”的異己分子。紅衛兵指責他回國的動機可疑，階級出身低下，喪失了愛國資格，兩人對話之後是主人公的內心獨白：

天底下有這樣難答的問題，我算是第一次遇上了。我丟下十七年青春，就這樣稀里糊塗犯了“愛國有罪”。我問自己，我就是不願在僑居地“混”，所以坐了五夜六日的船，唱着“五星紅旗迎風飄揚”的歌兒，光明磊落踏入祖國的大地，十七年的青春血汗灑在這裏，這行為判着“混進來的階級異己分子”？³¹

既然“報國無門”、“愛國有罪”，主人公詢問可否重返海外？造反派回答說，這也會犯下“叛國罪”。主人公進退兩難，只好聽天由命了。美國政治哲學家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特定社會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標準可形成人類的兩類生命：“可活的生命”（the livable Life）與“不可活的生命”（the unlivable Life），後者指人類苦難和不公的極端狀態會使某些人淪為脆弱的、易受傷害的群體，他們的生命

29 駱賓路：〈西裝恐懼症〉，載氏著：《她說，藍的是天空》，頁134-36。按：這篇小說也有作者的自傳色彩，參看駱賓路：〈兩件西裝〉，載氏著：《點點滴滴在心頭》（新加坡：斯雅舍，2010年），頁140-41。

30 駱賓路：〈怎可以槍斃〉，載氏著：《她說，藍的是天空》，頁120-23。

31 駱賓路：〈什麼都可以入罪〉，見氏著：《她說，藍的是天空》，頁118。

狀態缺乏必要的支持和關照，甚至無法存活。³²“文革”強調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二元對立以及極端的身分政治，結合傳統中國思想中的血統論和等級觀念，把政治暴力合法化和神聖化，製造出無窮的災難。³³在駱賓路的小說中，“歸僑”這個社會集團被判定為“不可活的生命”，不但喪失了幸福、尊嚴和平等，連最基本的生存權也被剝奪了。這種關於政治暴力和創傷記憶的書寫顛覆了歸僑作家群的民族主義的敘事，補充了更為複雜的文學圖像。

1963年，忠揚北上中國，成為“歸僑”，就讀於北京的外語專科學校。1979年，他離開內地，移居香港。他在1990年代出版中篇小說集《昨日夢華中》和《回首夕陽紅》，充分展現歸僑遭受的苦難和多年後再次移民的心路歷程，也似乎融入了他本人的故事。這兩部書收錄了六篇中篇小說，採取日記體、書信體和全知視角，敘述南洋華僑漂泊離散的故事。駱賓路創傷書寫的主人公都是普通歸僑，在題材和主題上有單薄重複的特點，而忠揚作品在主題上有多樣性和思想深度，主人公還有南洋左翼青年和馬共分子的身份。例如〈逃〉中的龔平和麗紅，³⁴〈天長地久〉中的藍濤和張芷梅，³⁵他們的人生遭遇與南洋冷戰有關。其他四篇小說的主人公都有南洋歸僑的身份，例如〈撿來的日記〉中的菲律賓歸僑洪先生，〈旅程〉中的印尼歸僑李天財，〈青春夢裏人〉中的南洋歸僑王少林和姜楚萍，〈重逢在香港〉中的新加坡歸僑黃志雄。他們有不堪回首的創傷記憶：興高采烈回國，遭遇政治浩劫，事業無成，情場失意，大好年華因而虛度，有的被發配邊疆，有的被捕入獄。後來移民香港，已是遲暮之年，回首血淚往事，恍若一夢，唯有痛惜，唯有抱憾，如是而已。忠揚這兩本書鋪敘歸僑的命運翻覆，見證暴力，控訴不義，字裏行間縈繞着傷逝悼亡的抒情氣息。下面逐一介紹這四篇小說，重點分析〈旅程〉和〈重逢在香港〉。

〈撿來的日記〉採用“日記體”的敘事結構，日記的作者是從閩南農村移居香港的“洪太太”。洪先生是一名樸實厚道的菲律賓僑生，他不曾想到回歸“新中國”後會吃盡苦頭。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結束，他拖家帶口，懷着一線希望流寓香港，而在香港這個殖民地的商業社會，他生計無着，苦悶掙扎。可以說，與洪氏夫婦“香

32 參看Judith Butler, Frédéric Worms, *The Livable and the Unlivable*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23).

33 文革時代的政治暴力給中國人留下嚴重的身心創傷，這在殘雪、余華、莫言、格非等先鋒作家的筆下，以及王小波、阿城的文字述作、黃蜀芹、張曉光的視覺文本中，都得到透徹的展現。參看楊小濱著，愚人譯：《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白睿文著，李美燕等譯：《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台北：麥田出版社，2016年）。

34 忠揚：〈逃〉，載氏著：《回首夕陽紅》（新加坡：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17-71。

35 忠揚：〈天長地久〉，載氏著：《回首夕陽紅》，頁131-89。

港夢”破滅的劇情主線交織在一起的正是“歸僑命運”這條或明或暗的副線。

〈青春夢裏人〉採用書信體的敘事手法，主幹部分是“姜楚萍”寫給她的舊情人“王少林”的兩封長信。1950年代，王少林還是一個意氣風發、充滿理想的青年，且已是南洋文壇一位很有潛力的詩人了。由於叛徒的出賣，王少林背井離鄉，來到他一直嚮往的北國，誰料想他在那裏度過了噩夢般的二十五年。1980年春，年近半百的王少林孤身來到香港。某天，他突然收到昔日女友“姜楚萍”的來信。原來，姜目前也在香港，她恰好在雜誌上讀到了王少林的詩作，引起她的痛苦羞愧的回憶，寢食難安，於是給他寫信，講述她的血淚交加、曲折離奇的人生道路。³⁶

〈旅程〉的主人公是印尼歸僑李天材，他是一名生活清貧、品德高尚的教師，在“文革”中被指控有“特務”的嫌疑，又被劃到“剝削階級”的成分裏，他寫了近百封信上訴，毫無結果，又寫了數百次的檢討書，甚至有了自殺的衝動。小說大篇幅敘述李天材在長途旅程中的所見所聞和回憶聯想，生動地描繪出一個歸國華僑在歷史風暴中的內心痛苦。小說中多次出現中共幹部對歸國華僑的肆意嘲諷，這讓李天材悲憤交加，又無可奈何。只有右派農民“劉良祐”及其女兒“清玉”真心關懷李天材，在殘酷的環境中閃耀着人性的光輝。結尾寫道：

可是，眼下仍然戴在他身上的無形的鎖鏈，卻依舊沒有松縛。他想忘卻少年時在那天涯海角生活過的點滴，忘卻生養他的雙親，忘卻青春年代有過的歡樂，忘卻終年椰風蕉雨的島國上的師友，以便心如死灰般地認命，麻木地將自己當成一個只有食和欲本能的生物，他才能真正沒有痛苦，沒有煩惱，沒有奢求地安排下半生。可是，這一切的希望和想，僅是一道一閃而過的電光，過後他又沉入更痛苦的深淵裏。三十多年的人生經歷，像火烙的印記，深深地打在他的腦海裏，無論如何也沒能將之磨滅掉。³⁷

李天材工作調動的旅程算是結束了，但其人生旅程遠未結束，述往思來，焦慮不安的情緒如影隨形，揮之不去。他飽受創傷，走投無路，不自覺喚起了溫暖的南洋經驗，轉念又想強制忘卻這段情感記憶，猶疑困苦，一籌莫展。借用巴特勒的說法，以李天材為代表的“歸僑”生命在暴力之下變成了“危脆生命”(precarious life)³⁸，忠揚通過符號表徵釋放了歸僑群體的內心痛苦，暗示他們進行哀悼和團結，尋求切實的

36 忠揚：〈青春夢裏人〉，載氏著：《昨日夢華中》，頁125-77。

37 忠揚：〈旅程〉，載氏著：《昨日夢華中》，頁123。

38 詳細分析參看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Verso, 2004).

解決之道：再見中國，流亡異鄉。“文革”結束後，不少歸僑回流到香港，甚至重返南洋，證實了這一點。

至此，駱賓路和忠揚的“文革敘事”帶出一個關鍵詞，那就是權力結構和政治暴力導致的“創傷”(trauma)。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早將日常生活中個人在身體或心理上受到的傷害(wound)，以“創傷”概念引入學術詞彙。心理學家斯圖盧羅(Robert D. Stolorow)指出，情感狀態的不可忍受性不能僅僅基於傷害性事件所引發的痛苦感受的數量或強度來解釋。“創傷”構建於一種主體間性的關係中，在這種關係中，劇烈的情感痛苦無法找到一個可以容納它的關係家園。在這樣的語境下，痛苦的情感狀態變得難以忍受，即“創傷”。³⁹對忠揚和駱賓路來說，“文革”首先造成了個人心理創傷(psychological trauma)。對“歸國華僑”這個社會集團來說，“文革”是有組織的社會暴力，折磨了個人，也對社會環境造成衝擊。對一個特定社會團體施加有計劃的迫害，導致其成員陷入創傷後的心理紊亂，這種原發性的創傷給社會的長期進程投下了重重陰影，無論是家庭，還是團體內部，或是團體之間。⁴⁰所以，文革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創傷”(social trauma)。

文革作為當代中國的“歷史記憶”(historical memory)，經過媒體記者、藝術家、小說家等知識分子的不斷敘述和闡釋，變成了一種典型的“文化創傷”。所以，“文化創傷”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後天形成的；它也未必是自然真實的客觀存在，而是文化建構和符號表徵的產物。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指出：“當一個集體的成員感到自己遭受了一場可怕的事件以後，文化創傷就發生了，這場事件在他們的群體意識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使他們的記憶永久化，並從根本上不可逆轉地改變了他們未來的身份認同。”⁴¹對於忠揚和駱賓路這樣的歸僑群體來說，正是因為文革給他們造成了慘痛的集體記憶，促使他們離開內地，移居香港，從“歸僑”一變而為“後歸僑”，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世界觀和身份認同。為何新馬歸僑的“文革”創傷要被反覆敘述？筆者認為，因為來自東南亞的歸國華僑數量巨大，占據了歸僑群體的絕大多數，他們見證了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滄桑巨變，在東南亞和中國的互動中做出了很大貢獻，也付出了很大犧牲。所以，東南亞歸僑的“文革”苦難給他們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創傷，擊破了血緣神話的神聖性和民族主義的釉彩，也暴

39 Robert D. Stolorow, *Trauma and Human Existence*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Analytic Press, 2007), 10.

40 Andreas Hamburger, et al. eds., *Social Trauma: An Interdisciplinary Textbook* (Switzerland: Springer, 2020), 3.

41 Jeffrey C. Alexander, “Toward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 in Jeffrey C. Alexander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

露了革命政治的破壞性和幽暗面。準此，“文革”造成的恐懼、震驚、困惑、痛苦、怨恨等複雜情緒，形成了一個顯著的創傷記憶和情感結構，歸僑作家要發憤以抒情，見證暴力，控訴不義，自證清白，昭告世人。

〈重逢在香港〉中的黃志雄生於新加坡，中學時代就是一個品學兼優的青年。女同學葆琴與他一起參加學生活動，互相欣賞，日久生情。後來，黃被驅逐出境，他北上中國，成為歸僑，在那裏生活了十幾年。黃在政治運動中受到株連，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北方荒原。1970年代末，他移居香港。一年半後，葆琴來到香港，與他重逢。黃說起當年的理想主義，葆琴質問他：是否願意繼續為“理想”而奮鬥終身？黃的回答既不是理想幻滅後的輕薄玩世和犬儒主義，也不是“告別革命”的流行論調，而是顯示批評思考和歷史理性：

這是一個時代的潮流，我們也許都是時代的犧牲品，如果說是時代欺騙了我們，那也不一定恰當。要是沒有我們當年的奮鬥，沒有那股歷史潮流，今天也許不是這個樣子。即使我們過去的做法，有些過火，有所偏差，也只因為我們年青、幼稚、不成熟的缺陷，絕不能把過去的一切都否定了。沒有我們過去的錯誤、失敗，就絕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功和成就。⁴²

如何看待創傷？創傷可否被表徵？如何被表徵？這是一個弔詭而艱難的任務。因為受害者對創傷有切膚之痛，但事後可能無力進行表徵，而進行表徵的人雖然有能力和意願，但可能缺席於彼時的歷史現場。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指出，創傷導致情感與表徵的分離：一個人迷失地感受着自己無法表徵的東西；一個人麻木地表徵着自己無法感受的東西；問題在於，歷史學能否以它自己的方式幫助人們逐漸接受過去的創傷和傷痕，而不是徒勞地試圖治愈它們。⁴³ 作為知識分子和文革受害者，忠揚有能力以小說的方式進行創傷的文化表徵。而黃志雄作為文革的親歷者和受害者，他對創傷的處理不是訴諸於宣洩和遺忘等治療技術，而是學會逐漸接受創傷，達成妥協，承認“絕對精神”以犧牲個人的方式達成了自身的目的。後來，黃說他寧願定居香港，結合個人興趣，因地制宜，從長計議。這個插曲說明忠揚認識到冷戰時代香港發揮的中介作用：香港不單擁有優越地理位置和大好商機，而且是一個自由開放的文化空間，兼容各種立場和聲音，這種“位置性”（positionality）

為身心受創的流亡者療傷止痛，提供人生再出發的可能性。

文革結束後，中國文壇掀起一波“傷痕文學”寫作潮。與此相反，許多歸僑作家在1980年代初重新歸隊，寫出大批作品，他們的主人公堅持家國情懷，選擇葉落歸根，一勞永逸。當然，主流歸僑作家“身在中國”的這個事實規約了他們的書寫方向，他們的創作意圖很明顯，那就是洗雪籠罩在歸僑頭上的“特務”、“間諜”等罪名，自證清白，昭示天下。是故“歸僑文學”的這種主導敘事蔚然成風。但本文討論的三個另類歸僑作家別有懷抱，他們回流香港或重返南洋，在文學世界裏馳騁批評想象，直書無隱，呼應“傷痕文學”的主題，為歸僑文學補充多重面向和豐富的細節。忠揚和駱賓路除了寫出歸僑的“文革”創傷記憶，他們的小說例如〈學歷〉、〈西裝恐懼症〉、〈他的三段病歷〉、〈撿來的日記〉、〈青春夢裏人〉、〈重逢在香港〉，繼續寫出“後歸僑”的“香港故事”，為我們觀察他們從“歸僑”到“後歸僑”的轉變，提供了完整的敘事脈絡。

三、南下香港：再離散、後歸僑與文化中介

1965年12月，正是“文革”前夕，原甸覺得“山雨欲來風滿樓”，於是悄悄離開北京，取道澳門，來到香港。駱賓路在暴風驟雨中苦撐十六年，才有機會在1973年8月來到香港，當時“文革”尚未結束。忠揚在內地辛苦生活了十六年，在1979年告別神州，移居香港。本章以原甸和駱賓路為主，以忠揚為輔，呈現和分析他們的香港經驗之兩重性。

原甸、駱賓路長居香港一、二十年，還是無法融入，只好重返新加坡，他們筆下的香港呈現出壓倒性的負面形象，成為另一類型的“創傷記憶”。旅居香港期間，原甸出版多本詩集，駱賓路有幾本小說集問世。這些作品的題材內容主要有兩類：一是“香港故事”，二是“南洋書寫”。香港是原甸和駱賓路的流寓之地，舉目所見，只有病態、罪惡和不幸；獅城是他們的故國家園，引領遙望，寫下感人的溫情故事。不過對忠揚來說，香港呈現出耐人尋味的兩副面孔。

作為底層人士、移民和詩人的原甸，其筆下的香港是資本主義的典型，這集中體現在他的詩集《詩的宣言》和《新年代前夕》中，主題大部分是暴露殖民地現代性和階級分化，對文化人在商業邏輯和市場法則下的困窘表達抗議。作為底層人士，原甸對生活現狀失望至極。作為移民，原甸無法融入當地，“南洋鄉愁”溢滿紙上。作為詩人，原甸描述作家在現代社會遇到的敵意，嬉笑怒罵，反諷自嘲。首先，原甸的香港形象缺乏空間正義和環境倫理。更重要的是，原甸確認香港是一個階級分化的城市，他本人就是受害者，為之痛心疾首，例如〈呸！小吃街〉、〈十年激烈〉。

42 忠揚：〈重逢在香港〉，載氏著：《回首夕陽紅》，頁102。

43 Dominick LaCapra,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42.

1977年9月，原甸開了一家銷售南洋食品的小店，就在這一年他寫出一首小詩，給出一個誇張的標題〈我們的詩死了〉。本詩是對香港殖民地商業文化的批判，使用排山倒海般的排比句、比擬、誇張和復沓，鋪陳導致詩歌死亡的多種因素，描述詩歌死後的淒涼處境。⁴⁴ 1978年7月，在詩集《詩的宣言》後記裏，原甸痛苦地寫道，由於為生計奔波，他的文藝創作荒廢了十年，生活對他來說就是一場艱苦的戰鬥。⁴⁵ 1979年12月，在詩集《新年代前夕》序言中，原甸以諷刺幽默的筆調寫自己在香港的落拓，詩人被迫疏遠詩歌，何其痛苦。⁴⁶ 1978、1979年，原甸寫出三首以“沙爹詩人”為題的作品。〈我是販賣者〉第一節寫道，在香港冬夜的街頭，詩人忙着燒烤南洋風味的沙爹肉串，由炭火、芫茜粉與茴香粉混合的熱氣漂浮在空氣裏，讓他的心中升起南洋鄉愁。原甸把生活了十四年的香港呼之為“陌生的海島”，可見他作為底層移民無法融入香港，難以做到真正的“本土化”，產生不了文化地理學理論所說的“戀地情結”(topophilia)。第二節寫販賣沙爹的詩人——

在這一個時代的驛站 / 我是販賣者 / 我用熱烈的思想 / 編織着發燙的情感 / 在時代的風雲中 / 織着我的詩句一行行 / 織着我的詩篇一章章 / 我販賣着這一串串的詩句 / 我販賣着這一束束的詩行 / 我用痛苦捶打着人們的心靈 / 我用憤怒抓損了人們的神經 / 沒有人比我更憎恨痛苦與憤怒呵 / 而我全部的痛苦與憤怒 / 都為未來的歡樂而付。⁴⁷

這裏並置一系列的二元對立的事物：沙爹 / 詩歌、生活 / 理想、物質 / 精神、商品 / 文化、體力勞動 / 腦力勞動、形而下 / 形而上、痛苦 / 歡樂、失敗 / 成功，這些諷刺性的對比修辭激發詩人的憤怒和痛苦，攪擾着讀者安靜的心，鼓動他們抗議社會不公，儼然有紀弦的風格。原甸是告別了中國內地、移居香港的“後歸僑”，但心靈沒有融入香港，而是聯結着遙遠的南洋，這是典型的空間錯位。這些創傷書寫對於不在現場的後來讀者而言，是文化記憶的間接表徵，令人想到一位評論家的說法：“所有創傷經歷都暗示着根本性的錯位，這既是對事件本身的證明，也是不可能對其直接接觸的證明。”⁴⁸

44 原甸：〈我們的詩死了！〉，載氏著：《詩的宣言》（新加坡：萬里書局，1978年），頁7-11。

45 原甸：〈跋〉，載氏著：《詩的宣言》，頁78。

46 原甸：〈序〉，載氏著：《新年代前夕》（新加坡：萬里書局，1980年），頁1。

47 原甸：〈我是販賣者〉，寫於1978年3月15日，載氏著：《新年代前夕》，頁2。

48 Cathy Caruth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M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9.

駱賓路的“香港故事”暴露這個殖民地商業社會的各種問題。其一，批判香港社會流行的拜金主義，譴責資本家為富不仁和剝削壓榨。例如，大企業的林老闆貪婪狡詐、玩弄權術、自稱“僅次於上帝的人”。⁴⁹ 其二，講述香港底層人物的艱難生活，批判階級分化的社會現實。〈人與鼠〉是一篇黑色幽默的辛酸故事。主人公丁海在建築公司做了二十年的高樓散工，他把一隻咬傷他腳趾的老鼠倒掛在鐵絲網上，任其受太陽暴曬而死，沒想到“防止虐畜協會”的員工指控他“虐待家畜”。當天晚上，丁海的無名指又被老鼠咬傷了，令人啼笑皆非。⁵⁰ 其三，敘說文藝工作者在商業社會中的落魄。一家報紙登廣告招聘有經驗的副刊編輯，一位失業的老作家帶了一本他早年的詩集去應徵，可招聘方說他們需要年輕編輯。他只好失望地離開了報館，後來還住進了精神病院。⁵¹ 其四，描述香港社會愚昧落後的觀念、市儈習氣和人世百態。〈香港社會十二生肖〉一文把十二個生肖與人物命運結合起來，講述香港社會人世百態，涉及許多社會問題：犯罪、移民、偷渡、外勞、賣淫等。⁵² 根據維克羅伊(Laurie Vickroy)的研究，創傷敘事對個人和共同體皆發揮了重要功能，同時也對一個讀者社區產生吸引力：“由於受害者在言說上的存在局限，加之集體的壓抑，對複雜且艱難的經驗進行公共哀悼和敘事化是必然的。……社會與政治機構及其議程施加或加劇了創傷，因此公共知識對於扭轉此一局面至關重要。”⁵³ 從以上作品可見，駱賓路之香港經驗的大宗類型是創傷敘事(traumatic narrative)，這種敘事超過了“後歸僑”的人物類型，把人文關懷的筆觸對準普通香港市民，在對創傷事件的描述中表達哀矜之情。

原甸和駱賓路在內地和香港的複雜經歷也弔詭而諷刺性地說明，無論是對血緣神話和民族主義的皈依還是棄絕，無論是回歸中國內地還是流寓香港，作為“歸僑”和“後歸僑”的他們都無法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輾轉流落，無地自容。在社會主義中國，他們遭遇政治暴力，留下慘痛的身心創傷；在曾為殖民地的香港，他們被商業邏輯和市場法則折磨得傷痕累累，近乎發狂。如果說“北上”這個行動使得原甸、駱賓路和忠揚“找回祖國”，他們的身份從“海外華人”變成了“歸國華僑”，而文革帶來的“創傷記憶”又讓他們失去了祖國、變成移民境外的“後歸僑”；那

49 駱賓路：〈僅次於上帝的人〉，載氏著：《人與鼠》（新加坡：成功出版社，1991年），頁61-70。

50 駱賓路：〈人與鼠〉，載氏著：《人與鼠》，頁23-28。

51 駱賓路：〈他去應徵〉，載氏著：《她說，藍的是天空》，頁66-68。按：小說主人公的原型可能是詩人柳木下。

52 駱賓路：〈香港社會十二生肖〉，載氏著：《她說，藍的是天空》，頁165-94。

53 Laurie Vickroy, *Trauma an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2), 34.

麼，漫長艱辛的“香港經驗”進一步使他們的身份趨於複雜，因為他們沒有一勞永逸地“反離散”⁵⁴，而是變成了在身體上遊離於南洋和中國之外、在心靈上疏離香港的“離散華人”。美國學者拉卡普拉指出：“創傷性事件給受害者施加了最嚴重、最顯而易見且無法辯駁的傷害，但它也以不同途徑影響了接觸過這個事件的每一個人，包括作惡者、合作者、旁觀者、抵抗者、後來者。”⁵⁵ 在中國內地，是“文革”中的人物和事件造成原甸、駱賓路、忠揚的身心創傷；但在香港，是無所不在的市場邏輯、商業法則和高度貧富分化的社會結構。所以，他們的大宗作品屬於“創傷文學”（literature of trauma）。借用泰爾（Kali Tal）的說法，這種創傷文學的寫作出於一種需要：講述和重述創傷經驗的故事，使它對受害者和共同體都顯得真實。這種寫作對受到創傷的作者來說既是一個驗證，也是一個宣洩的媒介。⁵⁶ 進而言之，從他們的人生故事中喚出一系列古老問題的辯證與重審：創傷是人類情感生活中的常態嗎？身心創傷如何被文學表徵？流亡與回歸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嗎？回到家園才能獲得實實在在的幸福？這些問題涉及文學表述與人類經驗中已知與未知的部分，迴響着卡魯絲（Cathy Caruth）關於創傷與文學的看法：“創傷看來遠不只是一種病理學或者僅是受傷心靈的疾病：它始終是一個傷口在哭喊的故事，試圖告訴我們一個無法獲得的真相。這個真相在其延遲出現和遲來解決中，不僅關乎已知，也關乎我們行為和語言中仍然未知的東西。”⁵⁷

對原甸和駱賓路來說，香港既然是一個傷心之地，難以安枕，無法融入，飽受人生迷失（disorientation）和認同危機（crisis of identity）之苦；那麼，剩下的選擇就是揮灑南洋鄉愁、苦思故國家園了。原甸的〈歸〉第二節寫抒情自我在內地和香港流浪多年，晝思夜想南洋家鄉：

從此我在陌生的陸地或海島上 / 日夜對着南來的風 / 作着深情的深呼吸 / 在晴朗的夜間 / 用濕透的手巾 / 揩着當空的月亮 / 端詳着這一面千里共映照的明鏡 / 有無映我的黑色的河 / 和河旁的我的碎裂的心⁵⁸

54 參看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年）。

55 Dominic LaCapra, *History and Memory after Auschwitz*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8-9.

56 Kali Tal,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 of Traum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1.

57 Cathy Caruth,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M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58 原甸：〈歸〉，載氏著：《寫在中國的詩》（香港：新馬文化社，1976年），頁51-52。

最後一節出現情感的猝然轉折，筆觸從過去回到眼前，寫詩人今夜攜帶行李，按捺不住狂喜的衝擊，即將奪門而去。他說，行囊裏有一疊待寫的詩稿，題目就是一個“歸”字：

一個赤道線上的作家，面對着浩瀚的大中華文化，應該不應該融入？能不能融入？是不是應該以付出本土身份的代價來融入？這是一個血緣、地緣、史緣與作品大決裂的大痛苦。我沒有從一個妥協的角度來理解它，因為我覺得在這個質變矛盾轉化的轉型期，理智的判斷有失平衡，重要的是忠實於你的內心，你的歷程的軌道歷史沉澱，這才是主要的。因此，這個時期，我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報刊上發表的作品一概署上“居港馬華文學工作者”的地區銜號。⁵⁹

出於這種南洋認同，旅居香港十八年的原甸，堅持過客身份，念茲在茲，不離須臾。從1979年到1980年，他寫下三篇評論，用挑釁性的語句進行自我身份定位：“我以馬華文學工作者之身擠於香港的文藝界，成了星馬文藝界與香港文藝界的‘兩棲動物’”⁶⁰、“一個做客香江的馬華文學工作者”⁶¹、“一個馬華文學工作者”⁶² 1979年末、1980年初，原甸撰文介紹香港詩歌發展史，論及他流寓香港期間的創作，他坦然強調詩中的南洋色彩。⁶³ 他明確指出：“原甸的詩，從實質上說，是旅居外地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華族詩人的作品。”⁶⁴ 這是原甸對自己的文化公民權的表述。原甸在香港寫下長篇敘事詩《水流千里》，以主人公“陳明光”的離散故事為中心，致敬開拓南洋的華人先輩。⁶⁵ 他關懷新馬華文文學的歷史與現狀，至少寫過十篇文章，收入他的批評文集《香港·新馬·文藝》出版。⁶⁶ 原甸還忙中偷閒，爬梳資料，煞費苦心地撰寫學術專著《馬華新詩史初稿》⁶⁷ 是故，馬華文學史家方修讚揚原甸是“星馬文藝界駐港的一個友好使者”，指出原甸雖然離開星馬時日不短，但他對本地文

59 原甸：《我的文學不歸路》，頁19。

60 原甸：〈漫談香港文藝界〉，載氏著：《香港·星馬·文藝》（新加坡：萬里書局，1981年），頁46。

61 原甸：〈作家職業化、專業化問題——一個港法作家座談會的雜感〉，載氏著：《香港·星馬·文藝》，頁38。

62 原甸：〈作家·香港作家·文學及詞典〉，載氏著：《香港·星馬·文藝》，頁34。

63 原甸：〈香港詩壇一瞥〉，載氏著：《香港·星馬·文藝》，頁20-21。初稿寫於1979年9月，修訂於1980年1月。

64 原甸：〈香港詩壇一瞥〉，頁22。

65 原甸：《水流千里》（香港：新馬文化社，1978年）。

66 按：《香港·星馬·文藝》收錄十篇與新馬文學有關的文章。

67 原甸：《馬華新詩史初稿》（香港：三聯書店；新加坡：文學書屋，1987年）。

化生活還是很熟悉的，並沒有和馬華文藝界脫節。⁶⁸ 以上證據說明身在香港的原甸放棄了華僑歸國的民族主義情結和葉落歸根的傳統血緣觀念，可是作為一名“後歸僑”，移民香港後又無法融入，被迫做出第三種選擇，那就是堅持南洋認同、苦思故國家園。這儼然又是“反歸僑”的思想意識了。

駱賓路的“南洋書寫”敘述華僑華人的流離身世、家庭問題和社會病態，傳達深沉動人的人文關懷與愛國情操。他在香港出版三本小說集，其中一些是新加坡題材。短篇小說集《咖啡，正香濃》有六篇小說標明新馬背景，其中兩篇有濃烈的南洋鄉愁和國族認同，即〈咖啡，正香濃〉和〈落葉歸根〉。〈落葉歸根〉表達離散華人的落地生根觀念和對獨立以後新加坡的國族認同。1982年，新加坡華人葉德全六十歲了，他即將退休，想到葉落歸根，但是歸去來兮，歸向何處？葉德全年輕時多次想過這個問題，那時他有寄人籬下的悲憤。幾十年下來，葉德全對這個新生國家有根土相依的感情。但正像大部分四十歲以上的華人一樣，葉和中國內地有一段“臍帶之情”，有時甚至超過了他對第二故鄉的感情。⁶⁹ 小說的末尾，葉德全一改幾十年來對“榴蓮”的排斥心理，主動向兒子索要榴蓮來品嚐，這暗示他在新加坡“流連已久”，決定要在這裏“葉落歸根”。顯然，漂泊離散與家國認同正是這個小說的主題。在江一明這位不斷漂泊的歸僑身上分明有駱賓路自己的影子，而葉德全對中國的血緣神話的堅持，也暗示駱賓路在思想意識中的新加坡認同。這篇小說也是駱賓路的自我實現的預言，因為寫完這個小說若干年後，他恢復了新加坡公民身份，在1996年重返獅城。小說〈咖啡，正香濃〉藉助於一個南洋版本“浪子還鄉”的故事，暗示流寓香港的駱賓路在內心深處對新加坡的國族認同。1950年代的新加坡，人民大眾熱烈追求自治和獨立，“杜老頭”那時也是熱血青年，甚至還有北上的想法，他起初和新加坡的關係若即若離，後來隨着新加坡欣欣向榮，他慢慢轉變了心意，產生了國族認同。一年前，兒子小華揚言要移民美國、棄絕新加坡，一下子激怒了杜老頭。後來，小華在三藩市遇到一個愛國的印度學者，讓他受到震動，改變了入籍美國的想法，一年後就回新加坡了。杜老頭對兒子的思想轉變和萬里歸來深感欣慰，杜太太也給兒子端來一杯香濃的咖啡表示慰問。⁷⁰ 從駱賓路的人生歷程及其作品來看，他對北上中國成為歸僑的選擇頗感後悔，遂離開內地，移民香港，成為一名“後歸僑”。可是在香港生活一、二十年後，這名“後歸僑”依然無法融入，

68 方修：〈序〉，載原甸：《香港·星馬·文藝》，頁2。

69 駱賓路：〈落葉歸根〉，載氏著：《咖啡，正香濃》（新加坡：新亞出版社；新加坡：新加坡文藝研究會，1990年），頁85。

70 駱賓路：〈咖啡，正香濃〉，載氏著：《咖啡，正香濃》，頁102-17。

他像原甸一樣，無時不渴望重返新加坡，回到人生的原點，似乎惟其如此，才能療傷止痛，安頓身心。

雖然同樣有“歸僑”和“後歸僑”的身份，忠揚的思想意識與原甸、駱賓路不大相同。他從香港文藝的角度切入，描繪的香港形象宛如希臘神話中的“雅努斯”（Janus），呈現耐人尋味的兩副面孔：一方面，是殖民地的商業邏輯和市場法則窒息了中華文化的發展和純文藝的生產；另一方面，是優越的地理位置與寶貴的言論自由，讓這個地方在推進世界主義的過程中扮演“中介”角色。既然香港同時存在“兩副面孔”，忠揚對香港抱着“愛恨交加”的矛盾態度也就不難理解了。忠揚強調，香港文藝與中國內地關係密切，“五四運動”發生後迅速波及香港和海外華人社會，使得“香港新文藝得以在五四運動的有力感召下，開始清除舊文藝的廢墟，建立自己的基地，組織自己的隊伍，接着開展香港新文藝的運動。”⁷¹ 他指出，此後三十年間的香港文藝一直是中國文藝運動中一股不能忽視的力量。遺憾的是，嚴肅健康的文藝不是香港文藝主流。香港文化從表面上呈現了一派繁榮的景象，每天發行的報紙有五十多家，穩居亞洲第二，期刊雜誌數量極為可觀。然而，聲色犬馬的東西佔了很大比重。港英當局對中國內地和台灣的思潮文藝漠不關心，採取自由放任、不偏不倚的文化政策；內地視香港文藝為外宣工具；台灣當局鼓勵香港文人利用文藝體現其政策威力。在多邊互動的文化關係中，香港文藝得不到實際的扶持，作家思想與作品的商業化非常嚴重。⁷² 忠揚不愧是一位目光敏銳的批評家，他在1979年移民香港不久，很快對香港文壇有了準確把握，本文寫於1980年，可見他的洞察力。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三個個案的共同點，均有相當長的旅居香港時段。香港位置成了一個弔詭的所在。1940年代末期，大批左翼作家在香港停留，從事出版，例如茅盾、郭沫若、夏衍、胡愈之、杜運燮、韓萌等等。香港是這些“歸僑”返回中國之前的中轉站，顯然不是一個單純化的殖民地商業都市，而是因為香港處在多重帝國的間隙，社會結構有多層次性，居民和作家享有一定程度的多元文化和言論自由。從歷史與地理、經濟與政治的多重疊合的語境出發，忠揚揭示香港文藝發展的客觀條件，尤其強調香港作為“全球城市”在東西方交流的場域中以及在亞洲區域內部發揮的中介作用：

71 忠揚：〈香港文藝發展的主觀條件〉，載氏著：《文苑縱筆：香港、新馬文藝談》（香港：華南圖書文化中心，1982年），頁9。

72 忠揚：〈香港文藝界的現狀〉，見氏著：《文苑縱筆：香港、新馬文藝談》，頁14-26。寫於1980年9月13日。

六、七十年代以後，伴隨着香港在政策上的更加自由開放，商業貿易帶來的經濟發展，它不僅成為東、西方各國文化交流、匯集的櫥窗，而且也成為溝通隔絕於台灣海峽兩岸的中國大陸與台灣，繼承和發展中華文化的渠道，同時，也是散居於世界各地的華裔社會維繫共同文化傳統的紐帶，由此而給散居世界各地，特別是咫尺近鄰的東南亞地區的華人社會構成了一幅香港文藝欣欣向榮、興盛發展的繁榮景象。⁷³

忠揚指出，香港有優越的自然地理位置，在現代航運和通訊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香港成為整個東半球通向各地區的交通樞紐，世界各國給香港帶來了它們各自的文化藝術，或者通過香港這個樞紐把它們各自的文化藝術傳播到其他國家和地區。因而這些因素構成香港充分吸取東西方文藝的有利條件，這就使得香港文藝具有豐富性和複雜性。⁷⁴ 忠揚從世界歷史的發展軌道來分析問題。他深刻指出，冷戰年代的香港，是一個自由開放的文化空間。二戰結束後，英國國力削弱，東方殖民地紛紛獨立，大陸政權易手，英國對香港採取靈活務實的措施，這在很大程度上為香港打開了方便的大門，容納各種文藝思潮。而且，香港文藝的發展並不局限於香港本身，而是與東南亞、西歐、北美的全球華人社會保持密切互動。⁷⁵ 如前所述，忠揚曾寫過兩三篇小說，講述男女主人公歷經劫難，在香港重逢的故事。忠揚為什麼要把故事背景設置在“香港”？根據生活經驗，忠揚認定香港夾在南洋和中國之間，具有地理位置上的居間性和優越性，在風聲鶴唳的冷戰年代，香港成了一個自由世界，一個避風港，它為那些身心受創的歸僑療傷止痛。〈重逢在香港〉裏，葆琴詢問黃志雄：“現在願意重返新加坡，還是定居香港？”黃回答說，他選擇棲居香港這塊殖民地，以因地制宜，穩健發展：

我只是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喜歡自由自在生活的人，不願去仰人鼻息，也不願受人拘束，不去追求什麼，也不須時時擔心失去什麼。能夠讓我這樣生活，我已經滿足了。⁷⁶

伴隨着時間流動與空間移位，個體生命的思想意識產生了顯著變化，離開中國就是

“告別革命”，隨之出現從“左翼知識分子”到“自由主義者”的轉變。這說明香港在冷戰年代和殖民地時代發揮了中介作用：香港作為殖民地文化空間、中西之間的緩衝地帶以及自由開放的全球城市，兼收並蓄，悅納異己；它接收了那些流亡者並將其改造成自由主義者，從“他者”一變而為“我者”，進而融入本土，重新啟航。由此，他們從擁抱民族主義的“歸僑”轉變為走向世界主義的“後歸僑”。

結語：重返南洋再出發

如今，“冷戰”已成為沉入歷史深處的幽靈，“歸僑”也成了不合時宜的話題。然而，兩者的歷史輪廓和蹤跡依然清晰，在亞洲國家的社會文本和文化形式中留下了回聲。本文聚焦於四個關鍵詞“冷戰”、“離散”、“創傷”與“認同”，對忠揚、原甸、駱賓路的人生與文學進行描述、分析和評判，研討他們從“歸僑”到“後歸僑”的心路歷程和文學想象。所以，“歸僑”和“後歸僑”既是政治身份，也是文化群體，還是精神結構。

必須承認，放回到近代中國歷史情境中來看，“歸僑”的類型相當多元。有的為了參加抗戰救亡運動，例如王嘯平與葉尼。有的因為1940年代末期的政治遣返，投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國運動，如洪絲絲、馬寧、丘士珍。有的為了躲避政治迫害，例如韓萌與黑嬰。還有的生於新馬，返回原鄉就學，隨後回到新馬，後來在1940年代末或1950年代初因各種因素而返回中國，例如杜運燮與蕭村。換言之，“歸僑”有不同類型和多重移動路線。如果說，“歸僑”意味着對血緣神話的承諾、個人從出生地到祖籍國的跨國流動、自我主體的重新安置和國族認同的再定義，是一勞永逸、別無他想的葉落歸根；那麼“後歸僑”意味着華僑歸國後，無法適應當地社會，甚至格格不入，在歷經政治浩劫後，理想幻滅，只好黯然離開，重啟漂泊離散，放棄了原先的政治忠誠和價值觀。更有甚者，他們流寓香港多年後，無法融入，心靈受創，只得重返出生地，擁抱故國家園。

原甸在內地和香港流浪了二十年（1964–1984）以後，在1984年10月回歸新加坡，他激動地寫下〈疲倦的鳥回巢了〉，賦詩明志。忠揚離開南洋二十三年後，在1986年首次踏上新加坡的土地，在1993年、1994年左右獲取公民身份。駱賓路在外流浪了四十年（1957–1996），在1995年恢復新加坡國籍，於1996年回到獅城。這時他即將六十二歲，真是：少年去國，白首方歸，一生漂泊，葉落歸根。此時，冷戰終結有時日，新加坡進入全球化的“後殖民時代”，新的文化景觀出現了。與賀巾等馬共作家不同的是，忠揚、原甸、駱賓路沒有從事過激進的政治活動，而且後來遷出了中國內地，放棄了左翼理想，所以成功取回新加坡國籍。

73 忠揚：〈香港文藝發展的客觀條件〉，頁3–4。

74 忠揚：〈香港文藝發展的客觀條件〉，頁4–5。

75 忠揚：〈香港文藝發展的客觀條件〉，頁5–7。

76 忠揚：〈重逢在香港〉，載氏著：《回首夕陽紅》，頁123。

本文所採用的“後歸僑”之“後”有兩層含義：一是時間上的終結，即歸僑在中國內地的居留生活的完結；二是性質上的改變，即從擁抱“民族主義”到走向“世界主義”，從追逐“左翼理想”到轉向“自由主義”，從“回歸原鄉”到“認同南洋”，從在世俗道路上奔波的“無神論者”，轉向過着屬靈生活的“基督徒”。總而言之，這三位“後歸僑”作家通過回歸、寫作和時間而達到了療傷止痛的效果：傷口即聲音，寫作即見證，時間即治療。他們的“後歸僑”書寫生動地呈現了一個特殊群體的“創傷記憶”——這些創傷在中國內地由“文革”政治暴力所致，而在香港則由商品拜物教使然。在這些“後歸僑”的離散經驗和身份轉變的背後，是南洋、中國、香港和全球史的不斷變化，以及個人的思想觀念、歷史境遇和外在行動這三者之間的互動、協商與調適。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 (德) 埃里希·奧爾巴赫著，吳麟綏等譯：《摹仿論——西方文學中所描繪的現實》，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Auerbach, Erich.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 Wu Linshou et al. Tianjin: Baihua wenyi chubanshe, 2002.]
- (美) 白睿文著，李美燕等譯：《痛史：現代華語文學與電影的歷史創傷》，台北：麥田出版社，2016年。[Berry, Michael. *A History of Pain: Trauma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ilm*, translated by Lee Meiyan et al. Taipei: Maitian chubanshe, 2016.]
- (美) 布斯著，華明等譯：《小說修辭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年。[Booth, Wayne Clayton.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translated by Hua Ming et al.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1987.]
- (新) 方修：《戰後馬華文學史初稿》，吉隆坡：馬來西亞華校董事會聯合會總會，1987年。[Fang Xiu. *A Draft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Postwar Malaysia*. Kuala Lumpur: Malaysi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chools Boards of Directors, 1987.]
- (日) 原不二夫著，劉曉民譯：《馬來亞華僑與中國：馬來亞華僑歸屬意識轉換過程的研究》，曼谷：大通出版社，2006年。[Hara, Fujio. *Malaysian Chinese and China: A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Belonging Consciousnes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Malaya*, translated by Liu Xiaomin. Bangkok: Datong chubanshe, 2006.]
- (德) 黑格爾著，王造時譯：《歷史哲學》，上海：上海書店，1999年。[Hegel, G. W. 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Wang Zaoshi.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1999.]
- 黃小堅：《歸國華僑的歷史與現狀》，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Huang Xiaojian.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Hong Kong: Xianggang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05.]
- (美) 弗雷德里克·詹姆遜著，王逢振、陳永國譯：《政治無意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Jameson, Frederic.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translated by Wang Fengzhen and Chen Yongguo.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99.]
- 駱賓路：《咖啡，正香濃》，新加坡：新亞出版社、新加坡文藝研究會，1990年。[Luo Binlu. *Coffee is Fragrant*. Singapore: Xinya chubanshe & Xinjiapo wenyi yanjiuhui, 1990.]
- ：《人與鼠》，新加坡：成功出版社，1991年。[Luo Binlu. *Of Mouse and Man*. Singapore: Chenggong chubanshe, 1991.]
- ：《她說，藍的是天空》，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Luo Binlu. *She*

- Said, *The Sky Is Blue*. Hong Kong: Huoyi chuban shiye youxian gongsi, 1996.]
- ：《海與島》，新加坡：新加坡文藝協會，2001年。[Luo Binlu. *The Sea and the Island*. Singapore: Xinjiapo wenyi xiehui, 2001.]
- ：《看海去》，新加坡：新加坡文藝協會，2003年。[Luo Binlu. *Go to See the Sea*. Singapore: Xinjiapo wenyi xiehui, 2003.]
- ：《點點滴滴在心頭》，新加坡：斯雅舍，2010年。[Luo Binlu. *Every Little Bit in My Heart*. Singapore: Siyashe, 2010.]
- （日）奈倉京子：《“故鄉”與“他鄉”：廣東歸僑的多元社區、文化適應》，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Nagura, Kyoko. *Hometown and Foreign Land: The Multi-Communities and Cultural Adaption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in Guangdong*.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10.]
- 牛軍凱、袁丁編：《歸國與再造僑鄉——越南歸難僑訪問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年。[Niu Junkai and Yuan Ding, eds. *Returning to Motherland and Remaking of Qiaoxiang: Interviews with the Chinese Refugee from Vietnam*.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chubanshe, 2014.]
- 史書美：《反離散：華語語系研究論》，台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2017年。[Shih, Shumei. *Against Diaspora: Discourses on Sinophone Studies*. Taipei: Lianjing shiye chuban gongsi, 2017.]
- （美）蘇珊·桑塔格著，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台北：大田出版社，2008年。[Sontag, Susan. *Illness as Metaphor*, translated by Diao Xiaohua. Taipei: Datian chubanshe, 2008.]
- （新）孫愛玲：《論歸僑作家小說》，新加坡：雲南園雅舍，1996年。[Soon, Ai Ling. *On the Fictions of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Writers*. Singapore: Yunnan yuan yashe, 1996.]
- （美）王德威：《後遺民寫作》，台北：麥田出版社，2007年。[Wang, David Der-Wei. *Post-loyalist Writing*. Taipei: Maitian chubanshe, 2007.]
- （新）王賡武：《中國與海外華人》，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1994年。[Wang, Gungwu. *China and Chinese Overseas*. Hong Kong: Xianggang shangwu yinshuguan, 1994.]
- （英）伊恩·瓦特著，高原、董紅鈞譯：《小說的興起：笛福、理查遜、菲爾丁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年。[Watt, Ian.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translated by Gao Yuan and Dong Hongjun.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1992.]
- 楊小濱著，愚人譯：《中國後現代：先鋒小說中的精神創傷與反諷》，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Yang, Xiaobin. *The Chinese Postmodern: Trauma and Irony in Chinese Avant-garde Fiction*, translated by Yu Ren. Taipei: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2009.]
- （新）原甸：《青春的哭泣》，新加坡：草原文化社，1962年。[Yuan Dian. *The Cry of Youth*. Singapore: Caoyuan wenhua she, 1962.]
- ：《寫在中國的詩》，香港：新馬文化社，1976年。[Yuan Dian. *The Poems Written in China*. Hong Kong: Xinma wenhua she, 1976.]
- ：《詩的宣言》，新加坡：萬里書局，1978年。[Yuan Dian. *Poetic Manifesto*. Singapore: Wanli shuju, 1978.]
- ：《水流千里》，香港：新馬文化社，1978年。[Yuan Dian. *Water Flows Thousands of Miles*. Hong Kong: Xinma wenhua she, 1978.]
- ：《新年代前夕》，新加坡：萬里書局，1980年。[Yuan Dian. *The Eve of a New Era*. Singapore: Wanli shuju, 1980.]
- ：《香港·星馬·文藝》，新加坡：萬里書局，1981年。[Yuan Dia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rts*. Singapore: Wanli shuju, 1981.]
- ：《馬華新詩史初稿》，香港：三聯書店；新加坡：文學書屋，1987年。[Yuan Dian. *A Draft History of Malaysian Chinese Poetry*. Hong Kong: Sanlian shudian; Singapore: Wenxue shuwu, 1987.]
- ：《我的文學不歸路》，新山：陶德書香樓，2003年。[Yuan Dian. *My Literary Odyssey of No Return*. Johor Bahru: Taode shuxianglou, 2003.]
- ：《馬騮人未倦——我的半生拼圖》，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年。[Yuan Dian. *The Horse Is Tired, but the Man Is Not Yet Weary: My Half Life in Jigsaw Puzzle*. Singapore: Qingnian shuju, 2007.]
- （新）忠揚（1938—2022）：《文學與人民》，新加坡：草原文化社，1962年。[Zhong Yang. *Literature and People*. Singapore: Caoyuan wenhua she, 1962.]
- ：《文苑縱筆：香港、新馬文藝談》，香港：華南圖書文化中心，1982年。[Zhong Yang. *Impromptu Observations on Literary Arena: Essays o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Hong Kong: Huanan tushu wenhua zhongxin, 1982.]
- ：《新馬文學論評》，香港：三聯書店；新加坡：文學書屋，1986年。[Zhong Yang. *Critical Essays on Chinese Singaporean and Malaysian Literature*. Hong Kong: Sanlian shudian; Singapore: Wenxue shuwu, 1986.]
- ：《昨日夢華中》，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2年。[Zhong Yang. *Yesterday, A Dream*. Hong Kong: Huoyi chuban shiye youxian gongsi, 1992.]
- ：《回首夕陽紅》，香港：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Zhong Yang. *Looking Back at the Sunset*. Hong Kong: Huoyi chuban shiye youxian gongsi, 1997.]

——：《忠揚文學雜論集》，新加坡：斯雅舍，2010年。[Zhong Yang. *Zhong Yang's Miscellaneous Essays on Literature*. Singapore: Siyashe, 2010.]

英文書目

- Alexander, Jeffrey C., et al.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Butler, Judith.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Verso, 2004.
- , and Frédéric Worms. *The Livable and the Unlivable*.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23.
- Caruth, Cathy,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Eyerman, Ron. *Memory, Trauma and Identit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 Hamburger, Andreas, et al., eds. *Social Trauma: An Interdisciplinary Textbook*. Cham, Switzerland: Springer, 2020.
- Imy, Kate. *Losing Hearts and Minds: Race, War, and Empir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915–196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 LaCapra, Dominic. *History and Memory After Auschwitz*.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 *Writing History, Writing Traum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Lee, Christopher J. *Frantz Fanon: Toward a Revolutionary Humanism*.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5.
- Levin, Harry. *The Gates of Horn: A Study of Five French Real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Leys, Ruth. *Trauma: A Genealog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 Ngoei, Wen-Qing. *Arc of Containment: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ticommunism in Southeast Asi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9.
- Ong, Soon Keong. *Coming Home to a Foreign Country: Xiamen and Returned Overseas Chinese, 1843–1938*.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 Peterson, Glen.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Stolorow, Robert D. *Trauma and Human Existence*.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Analytic Press, 2007.

- Tal, Kalí.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 of Traum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Vickroy, Laurie. *Trauma and Survival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2.

POST-RETURNEE WRITING:
DIASPORA, TRAUMA, AND IDENTITY IN THE
TIME OF COLD WAR

ZHANG SONGJIAN*

ABSTRACT In the time of Cold War era (1946–1991),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overseas Chinese people returned to China, who were named “Returnees” (*Guiqiao* 歸僑), a minority of them were literary writers. While literary writings of these returnee authors have been paid critical attention, a minority of them remain largely unexplored. These minority returnees subsequently departed from China, migrated abroad, and ultimately went back to their original birthplaces or their countries of residence. The paper refers to this special group of writers as “post-returnees”. The “post” in this term has two connotations: the end of timeline and a change in nat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ransnational careers and writing experiences of three “post-returnees” writers, i.e., Zhong Yang, Yuan Dian, and Luo Binlu, who originated in Singapore, moved to P. R. China, sojourned at Hong Kong, and finally returned to Singapore where their citizenship was resumed. Focusing on four keywords, namely, “Cold War”, “Diaspora”, “Trauma” and “Identity”, the paper aims to emplo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ontextualized approach to literary texts, analyse their identity shifts from “overseas Chinese” to “returnees” and to “post-returnees,” hopefully which opens a critical dimens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turnee Literature” (*Guiqiao wenxue* 歸僑文學) and Asia’s Cold War.

KEYWORDS The Cold War, Diaspora, Trauma, Identity, Post-returnee

* **Zhang Songji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inese, School of Humanit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